

超越李白：論北宋詩壇的文藝氣象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引言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¹ 李白、杜甫的詩歌不單燦照盛唐的詩壇，同時也是中國詩史上的高峰。雙星炯燦，燭耀千秋，中唐以來漸成定論。宋詩能在唐詩耀眼的光芒下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實在也是仰賴一代人共同努力、不斷開拓的成果。北宋詩壇瀰漫著樂觀豪邁的情緒，特別是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四家，他們在公元第一個千禧年的時代，面對偉大豐盛的唐詩，不亢不卑，創建自我的風格，寫出時代精神。宋人以重建儒學為己任，提倡氣節，關心文教，宏揚詩學，因此尊韓尊杜成了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而這也是北宋詩文革新的基本力量。宋人面對李白，才氣橫溢，神變莫測，大家心嚮往之，其實並不容易高攀；但對於歐、蘇來說，他們學養深厚，胸襟廣闊，洋溢著一股豪邁俊朗的浪漫精神。因此，他們在揣摩李白詩的神理聲色之餘，有時也會冒出「超越李白」的狂想。他們固以李白為學習對象，但又希望超越李白，表現自我，與服膺杜甫關懷君國、補察時政的儒者氣象完全不同。²

¹ 韓愈(768-824)：〈調張籍〉。按此詩大約寫於元和十一年(816)前後，意欲調和元稹(779-831)「李杜優劣論」的偏頗，參韓愈(著)、錢仲聯(1908-) (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989。案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撰於元和八年(813)，論云：「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見《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601。元稹只是從聲律的角度立論，不是李杜整體成就的比較，讀者或以為強分優劣，可能是有些敏感了。

² 嚴傑〈陶、杜典範的確立與宋詩審美意識的完成〉云：「從歐陽修之推韓、李到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之倡杜、陶，反映了審美意識從『發揚感動』到『悠然自得』、『無意為詩』的深刻變化。從中我們不難把握到時代的折光。」又云：「宋人所追求的『平淡簡古』，不可
〔下轉頁406〕

歐陽修〈廬山高〉解讀

宋代詩話中有一段公案，那是歐陽修劃時代的壯語，石破天驚，頗難論斷，但又值得推敲。葉夢得 (1077-1148) 云：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毘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秉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秉曰：『吾〈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我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³

此段文字一般以為歐陽修過於狂妄，區區三篇作品實未足與李白、杜甫的名作相比，更不要說超越李、杜了。朱熹 (1130-1200) 以為「此段恐嫌於誇而去之」。⁴ 又如王世貞 (1526-1590) 云：「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此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淺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太白率爾語，公能道否耶？二歌警句，如『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強自嗟』，尋常閨閣，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論學繩尺，公從何處削去之乎拾來。」⁵ 葉矯然 (順治九年 [1652] 進士) 云：「今其詩具在，試取太白〈廬山謠〉與較之，果何如也？〈明君曲〉前後篇與『群山

〔上接頁405〕

能是漢魏古詩的平淡簡古。宋人只能是在『平淡簡古』的價值觀念和追『古』求『老』的自由精神的指引下，超越唐人的形式『流俗』，從而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形式法則，在精神觀念與形式法則的統一上創造與唐詩氣象遠不相同的審美風範。」見嚴傑：《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490，496。

³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自序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24。宋胡仔(纂集)、廖德明(點校)：《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全錄《石林詩話》，惟字句少異。其後續云：「余在汝陰，見秉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卷二十九，頁200)

⁴ 宋朱熹《考歐陽文忠公事跡》云：「公惟嘗因醉戲親客曰：『〈廬山高〉它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文中以韓愈代李白，以李白代歐陽修，傳聞異辭，而自負之情則一。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影明刊本，卷七一，頁1306。

⁵ 參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卷四，頁213。盧全(775?-835)號玉川子，詩風奇特，近於散文。

萬壑』，直有仙凡之隔。人苦不自知，『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意永叔而作是言也。或曰其子揚厥考之詞，非六一語也。良然。」翁方綱(1733-1818)云：「李供奉雜言之體，乃壯浪者優為之，豈可以清直之筆仿乎？而《宛陵集》亦有之，固無怪其擊賞歐公〈廬山高〉至於傾倒若彼也。」復云：「歐公有〈太白戲聖俞〉一篇，蓋擬太白體也。然歐公與太白本不同調，此似非當家之作。〈廬山高〉亦然。」⁶ 諸家大抵皆以為歐不如李，風格不類，甚至推說是兒子頌揚乃父的誇飾之詞。加以葉夢得與新黨關係密切，論詩尚熙寧而薄元祐，推崇王安石，而指摘歐陽修、蘇軾、黃庭堅三家，則此條資料或出傳聞異辭，不見得絕對可靠。蕭慶偉云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二十云：「夢得為蔡京門客，又與章惇為姻家，本紹述之餘黨，故其持論與魏泰多同。」因此，葉夢得論詩專主王安石，亦勢所必然。在新舊兩黨交爭的政治背景下，主王安石則抑元祐，這在當時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葉夢得亦然。然其抑元祐又不同於魏泰，魏泰以不錄元祐諸公詩話而貶元祐，而《石林詩話》對於元祐諸公詩話則是錄而不贊，即所謂「陰抑元祐」也。⁷

歐陽修早卒，不在徽宗崇寧元年(1102)元祐學術禁毀之列，葉夢得並沒有必要醜化歐陽修。除非他是為了維護王安石的〈明妃曲〉，因而間接揭出了歐陽修的自負和狂妄。以上只是我的推測之辭，並無實據。但假如這段話真的是歐陽修說的又該怎樣理解呢？歐陽修酒後與兒子談詩，意興風發，暢所欲言，不是沒有可能的。加以賦性梗直，不畏權勢，議事論文，自有見地。例如歐陽修雖以時文取科第，卻又厭惡駢文，推崇韓文，登第以後即聯同尹洙(1001-1047)、梅堯臣(1002-1060)推動宋初的詩文改革運動。他著意跟李白一較高下，看來也不是無的放矢了。歐陽修〈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云：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唳鶴，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筵。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砮。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嘯。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

⁶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收入郭紹虞(1893-1984)(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二冊，頁1019；清翁方綱(著)、陳邇冬(1913-) (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三，頁89，83。

⁷ 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99。第三章〈北宋黨爭與宋人詩話〉中「蘇、黃詩風之貶」一節，即舉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及葉夢得《石林詩話》為例。



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癘。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玕。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硜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⁸

劉中允即劉渙(1000–1080)，梅堯臣詩自注或作劉復。⁹ 劉渙，字凝之，號西澗居士，謚文莊。筠州(今江西高安)人。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為潁上令。皇祐二年(1050)以太子中允致仕，歸隱南康(江西星子縣)。有關劉渙的事蹟及其致仕的原因，李常(1027–1090)嘗言之：

皇祐之庚寅，有潔身不辱之士，姓劉氏，諱渙，字凝之。行年五十，致其仕而歸。方是時，學士大夫爭為詠嘆以餞之，非所以寵其行，以預送凝之為榮耳。歐陽文忠公之詩，道其為人與夫去，最詳且工，人能誦之，謂為實錄。凝之博學強識，允蹈所聞，初欲推其長以及諸物，視世無與合者，浩然去之，莫遏也。色辭靖和，恂恂可親。及與之分辯義理是非之際，強毅不可輒奪，蓋其自持，猶圭玉然，寧缺以折，非矯揉可勝也。自少至於老，守之弗變，就其老而逆考之有加焉。少舉進士第，歷官至潁上縣令。其去也，始卜廬山之陽以居，五畝之宮，灌園茹蔬，踰三十年，隱几嘯歌，如豐泰者。噫！若予耳目所接，未見其偶也。兩以汎恩與其子通籍，由太子中允，三轉為屯田員外郎。享年八十有一。有文集二十卷。¹⁰

劉渙五十歲辭官歸隱，歐陽修指他「丈夫壯節」，「不可以苟屈」，李常稱他「潔身不辱」，自是皆有感於現實政治而發，用詞相當強烈。仁宗朝太平盛世，表面風光，實則冗官冗費，內外交困，民亂蜂起，朝政日非。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等雖次

⁸ 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冊一，卷五，頁84。

⁹ 宋劉元高編《三劉家集》，匯輯劉渙、劉恕、劉義仲三世遺文，兼錄歐陽修〈廬山高送中允〉及劉敞(1019–1068)、陳舜俞(?–1075)、僧了元等題贈劉渙之作。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輯本，集部八，總集類，第1345冊，頁553–54。又劉復一名則見於梅堯臣〈依韻和郭祥正秘校遇雨宿昭亭見懷〉一詩原注：「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送劉復。」見宋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756。又夏敬觀校云：「『復』當為『渙』訛。」僅作判斷，並未提出任何理據。參夏敬觀(1875–1953)、趙熙(1867–1948)(著)、曾克崑(1900–1975)(纂集)：《梅苑陵詩評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400。

¹⁰ 宋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并序〉，元豐三年(1080)十二月撰。見《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36冊，頁625。

第推行新政，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先憂後樂，氣象一新，可是損害了權貴的既得利益，讒謗交侵，翌年即倉皇求去。而北宋政壇上的朋黨之爭也漸漸演變為意氣之爭了。歐陽修蹈厲風發，直言強諫，雖仕途坎坷，多次遭受貶黜，惟寬簡愛民，安時處順，讀書有得，雖處於逆境中往往亦自得其樂。皇祐元年(1049)移知潁州(安徽阜陽)以後，即深受西湖的山光水色所吸引，有買宅卜居之意。〈廬山高〉乃錢行之作，推崇高潔的品德，為劉渙的辭官壯聲威，實則借題發揮，影射官場的無奈和現實的黑暗，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如果我們配合李常的記載來讀，更大有陶潛〈歸去來辭〉悲壯的違世意味。此詩一出，當時即傳誦甚廣，透露宋人的心聲，同時也具體呈現了一代特有的審美氣質。宋詩脫穎而出，完全擺脫唐詩的羈絆，見證宋詩時代的來臨，此詩顯出「本色」所在，也許可以視作唐宋詩風轉變的樞紐。梅堯臣、郭祥正(1035-1113)嘗一起朗誦此詩。《苕溪漁隱叢話》引《王直方詩話》云：

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為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數十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¹¹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少有詩名，豪邁精絕。梅堯臣以為太白後身。卒後鄉人祠之於青山李白祠。今存宋刻《青山集》、《郭祥正集》。¹² 皇祐六年，即至和元年(1054)，郭祥正初晤梅堯臣，為誦〈廬山高〉。梅堯臣〈依韻和郭祥正秘校遇雨宿昭亭見懷〉云：

君乘瘦馬來，骨竦毛何長。下馬與我語，滿屋聲琅琅。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出沒望林寺，遠近數鳥行。鬼神露怪變，天地無炎涼。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誦說冒雨去，夜宿昭亭傍。明朝有使至，寄多驚俗章(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送劉復)。¹³

由此可見，宋初詩壇長期困於白居易體、西崑體等仿唐擬古的詩風下，奄奄一息，了無生機。至歐陽修〈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詩始出而振之，大音鐘磬，

¹¹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頁200。

¹² 郭祥正有《青山集》三十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宋刻本，1990年)。參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

¹³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756。梅堯臣贈郭祥正詩甚多，例如〈采石月贈郭功甫〉、〈依韻和郭秘校苦寒〉、〈依韻和郭秘校昭亭山偶作〉、〈送郭功甫還青山〉等。前者起二句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即以郭祥正為李白後身也。

一洗頹風；確立了新世紀新氣象以至新的審美精神，歐陽修亦自以為是得意之作。不但自己津津樂道，甚至連師友之間的梅堯臣及青年詩人郭祥正都為他朗誦助威。「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一句，雖說目空一切，實際上就是要在詩壇上振臂一呼，喊出時代的強音。可以說，歐陽修學李白除了個人精神氣象的相似之外，更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訂出方向，振蔽起衰。¹⁴至於〈明妃曲〉兩篇超越李、杜的主張，則更是指示詩學多門，可以不斷的創新變化，開拓意境，不要劃地自限。李、杜的身影儘管高大，畢竟時代不同，品味各異，不可能全方位的牢籠百世，限制後人的創作。在寬廣無垠的文學天地裏，李、杜詩中還有許多尚未開發的地方，只要在一些前人不大的地方著力，必有新意，必有所得。歐陽修最後表現出「惟我能之」的氣概，飛揚跋扈，摒棄模仿，隱然自有一番承擔，一份勇氣，從唐詩的高大身影中突圍而出，而宋詩亦得以在新世紀中重新定位，創新面目。關於〈廬山高〉，近人評論的很多，例如劉德清、宋柏年、胡迎建、顧永新四家都有所論述，各有所見。劉德清云：

歐詩學李白，主要在七言歌行，形神都肖似太白體。如〈太白戲聖俞〉：……詩題下原注：「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這是刻意摹仿李白的詩篇。作者懷著景仰的心情，巧妙地將李白〈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作品的詩句和意境貫通起來，表現了李白詩歌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和風格。他的另一首作品〈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更是刻意仿效〈蜀道難〉，對廬山風貌展開多層次多角度的描寫。前半部分繪山狀水，孕含著詩人對朋友懷才不遇的感慨，宣洩了積聚於心中的憤懣不平，抑揚頓挫中透出英豪之氣。後半部分直抒胸臆，氣魄更顯雄放。全詩充滿奇情幻想，詩句參差錯落，隨著情感的跳躍變化更換韻腳，又夾入散文句式，詩境流轉，氣勢磅礴，酷似李白詩作。¹⁵

宋柏年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更是沖破了形式格律的束縛，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寫來氣勢雄渾，流瀉奔放，既兼顧了詩歌的韻律，又擴大了詩歌的容量。起到強調感情、深化主題的作用。¹⁶

¹⁴ 王安石〈葛蘿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李壁注(1159-1222)云：「公此詩體製頗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之傑作。」參宋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181。

¹⁵ 劉德清：《歐陽修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17-18。

¹⁶ 宋柏年：《歐陽修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129。

胡迎建云：

詩的前半部分寫廬山之雄奇崢嶸，先潑墨大筆揮灑，然後細細鉤勒皴染；後半部分寫劉凝之節操高尚，飄然歸隱於廬山。寫山是為了烘托人，達到如楊萬里所說「見了廬山想此賢」的效果。此詩句式參差錯落，磊落明快，意到筆隨，轉接自然，力欲以氣格高古取勝，酷似太白詩風。據當時李常所說「歐陽文忠公之詩道其為人與夫去最詳且工，人能誦之，謂之實錄。」在眾多送別、贊詠劉凝之的詩中，此詩影響最大，然以此詩與李白〈廬山謠〉或〈蜀道難〉相比，其氣勢之磅礴、想像之奇詭，歐詩當遜於太白詩，其缺陷的一方面正是在其實錄，拘於形似，騰挪奔逸不足。¹⁷

顧永新云：

此詩三百零三言，濃墨渲染山河壯麗，氣勢磅礴，格調高峻，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歐詩具有明顯的散文化傾向，這一方面是繼承了韓愈以文為詩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其詩風格質樸平易，並且多含議論，總是有頭有尾、原原本本地展開內容，常帶有鋪排的特點。¹⁸

以上四家基本上肯定了〈廬山高〉酷似太白詩風，也就證明了學李白是可能的。不過歐陽修並不以此為滿足，他更要從學習李白出發，超越李白，進而超越杜甫，步步挺進，盡其在我，寫出風格。這是詩人特有的抱負，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何必低頭？何必妥協？案〈廬山高〉共用十五韻字，全協上平三江韻，一韻到底，而且還是險韻，歐詩的韻腳裏面有很多非常用字，並不容易處理。蘇軾〈送楊孟容〉、黃庭堅〈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兩詩，亦同用江韻。¹⁹可見高手過招，因難見巧，因巧見意，目的還是藉以表現自我而已。又〈廬山高〉多用散文筆法，沒有固定字數，或兩句一韻，或三句、四句一韻，隨意施展，以文為詩。或說〈廬山高〉多仿李白〈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二詩，其實除了音節神韻彷彿相似之外，歐陽修也寫出了自家面貌。例

¹⁷ 胡迎建(1953-)：〈試論歐陽修七言古風之得失〉，收入劉文源(編)：《廬陵文章耀千古》(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270。引文參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并序〉訂正，《全宋文》，第36冊，頁625。

¹⁸ 顧永新：《斯文有傳，學者有師——歐陽修的文學與學術成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頁57-58。

¹⁹ 蘇軾詩見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冊五，卷二十八，頁1479。黃庭堅詩見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一冊，頁16。

如李白詩中多用典故，多用神話，上下古今，想像雄奇，諷刺現實，直抒胸臆；但歐陽修卻能一空依傍，既不靠典故和神話充實內涵，也不藉學問張大境界，純用白描手法，摹寫自然，更是完全健康自信的表現。〈廬山高〉在結構上可分兩段，前段至「時有白鶴飛來雙」止，描寫廬山風光，萬壑松濤，幽花野草，悅人心性，怡然自得；後段送友人歸隱，青衫白首掩映著青雲白石，刻劃高潔的情懷，君子懷寶，丈夫壯節，一切順其自然，不關寵榮聲利，不關得失感慨，胸懷坦蕩，自足與山川永壽矣。這一種天人合一、不雜仙風、表現生命的圓融滿足之感，是歐陽修所特有的氣質，李白何曾悟得？在這一點上，歐陽修可以說是超越李白了。黃庭堅云：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蹇蹇，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²⁰

黃庭堅在文中看來更有意將劉渙塑成了宋代文化永恆的形象，具有道學家「出淤泥而不染」的審美意義，甚至超脫了個人生命的利害得失，呈現出讀書人所共同追求的高風亮節和道德典範。劉渙固與廬山同其不朽，而歐陽修的〈廬山高〉當然更是宋詩不朽的象徵了。

至於〈明妃曲〉兩首，²¹寫於嘉祐四年(1059)，稍後於〈廬山高〉八年，歐陽修大抵是有意與李白〈王昭君〉(其二)、杜甫〈詠懷古跡〉(其三)²²的同題作品比較，只要能寫出新意，不要蹈襲舊調，即為突破。例如後篇〈再和明妃曲〉上半段「耳目所及尚如此，安能萬里制夷狄」，批評漢元帝，不見含蓄，自是宋詩風味；下半段由「明妃去時淚，灑嚮枝上花」開始，一派唐音雅調，「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沈鬱頓挫，深得杜詩的神韻，那自然是學杜的成果了。但歐陽修卻倒過來說：「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其實主要是點出杜詩特有的風格而已。又前篇〈明妃曲和

²⁰ 黃庭堅：〈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見《黃庭堅全集》第二冊，頁696。

²¹ 即〈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二首，參《歐陽修全集》，冊一，卷八，頁131，132。

²² 李白〈王昭君〉其二云：「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詠懷古跡〉其三云：「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參魯歌、高峰、戴其芳、李世琦(選注)：《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頁49-50。

王介甫作)則以散文化的筆調為主,創造宋詩的格式;但更重要的是歐陽修在立意上一空依傍,專寫華夷習俗及爭按新聲的盛況,結語指出「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批判現實政治不留情面。廟堂上下,沈醉於一片歌舞昇平之中,對夷狄缺乏認知,導至決策錯誤,意在言外,掩映在昭君古老蒼涼的故事之中,構成一曲變奏的樂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歐陽修詩寫的不再是兒女情長的美人故事,而是具有深刻寫實的思想內容,分析形勢,痛陳時蔽,而批判現實的豪邁精神也就超越杜甫的纏綿忠愛、勉盡言責的苦情了。

王安石《四家詩選》平議

歐陽修深慕李白詩,並以李白為學習對象。其〈李白杜甫詩優劣說〉論云:「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他欣賞李白的「天才」,然而並不否定杜甫的「精強」。性向所近,他自然是比較偏愛李白的,且由此啟動了北宋詩壇振衰矯俗的力量,掃除西崑迷霧,一新氣象,顯出領袖一代文風的威信。其後蘇軾認為歐陽修「詩賦似李白」,而王安石甚或以為「居太白之上」,這可能都成了歐門諸子的共識。例如蘇軾〈六一居士集敘〉:「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²³王安石嘗編《四家詩選》,今已久佚不傳,相傳的次序是杜甫、歐陽修、韓愈、李白,²⁴既不按年代排列,復以李白屈居四家之末,惹人非議。據說王安石有些解釋,惠洪(1071?-1128)「舒王編四家詩」云: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為《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矣。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²⁵

²³ 〈筆說〉,載《歐陽修文集》,冊五,卷一二九,頁1968;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冊一,頁316。

²⁴ 王晉光〈李白對王安石的影響〉稱四家的次序是杜甫、韓愈、歐陽修、李白,似乎並沒有文獻上的證據。見《中國李白研究·一九九一年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95。根據黃庭堅、王鞏、王直方(1069-1109)、李綱(1083-1140)諸家所見的記錄,歐陽修均在韓愈之上。

²⁵ 宋惠洪:《冷齋夜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43。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鍾山語錄》云:「白詩近俗,人易悅固也。白識見汙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卷六,頁37)

這些解釋沒有多少說服力，通通不成理由。所謂美人香草，自有託意，詩人不必過於執著文詞的表象。且以歐陽修的史學修養作為評詩的依據，風馬牛不相及，自然也不能相提並論了。至於所舉詩句「行人仰頭飛鳥驚」，可能是驚弓之鳥，我們完全看不到「佳趣」所在，令人費解。王鞏云：

黃魯直嘗問王荊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耶？荊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荊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²⁶

王鞏說更顯得編選隨意，不負責任。如果「初無高下」，那麼最好就是按年代排列，則李白宜置於首座而不是叨陪末席了。又陸游(1125-1210)云：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²⁷

陸游就詩論詩，頗能指出李白詩中的「淺陋」之處。這當然是時代及處境不同所致，同時也是唐宋價值觀、審美觀的差異所在。大抵王安石個性比較固執倔強，不可能欣賞李白狂放不羈、飛揚跋扈的個性；可是李白名高，又不能不選。於是將道德文章均無懈可擊的歐陽修置於李白之上，雖能一新天下耳目，然而在情理上卻難以使人信服。因此，歐陽修「超越李白」除了代表一種樂觀奮進的精神，同時更有道德情操的意義，指示正確的學詩途徑，發揮教化的作用，而歐陽修在北宋詩壇上的象徵意義自然要比李白深遠了。

對於李白的評價，歐陽修與王安石互有不同，文學史上還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供旁證。例如嘉祐元年(1056)歐陽修初晤王安石，看到詩文俊彥，後繼有人，顯得十

²⁶ 宋王鞏：《聞見近錄》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興中書局影印，1964年)，第五集，頁三二。新編冊二，頁1187。又參《苕溪漁隱叢話》，卷六，頁37-38。

²⁷ 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79。

分興奮，於是即席一腔熱情的寫下了〈贈王介甫〉之作。歐陽修不但以學習李白、韓愈自許，並以此期望後學。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²⁸ 首二句寫出對李白、韓愈的仰慕之情，至老不變；甚至認為王安石將來會在唐代李詩韓文繁花似錦的藝苑中脫穎而出，領導一代的文壇。第二句「吏部」當指韓愈。²⁹ 曾鞏(1019-1083)〈與王介甫第一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³⁰ 由此可見，歐陽修的文學觀是相當通達的，他尊崇孟子、韓愈，但卻不會一面倒的向權威低頭；更重要的，他反對模擬，要求創新，重視「自然」，也就是要有自家面目，不相蹈襲。由此看來，歐陽修自然不會以「似李白」為止境了。怎樣從傳統中開拓，推陳出新？怎樣提高？怎樣邁進一步？這些都成了新時代文學發展的重要課題，值得深思。不過王安石〈奉酬永叔見贈〉的答詩卻謙稱僅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希望繼承韓愈的「道義」和「文章」，顯出了師友相得、心靈交感之樂，但對於李白詩的期許卻全不領情。詩云：「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摠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坐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為貺豈宜蒙。」³¹

大抵王安石欽仰杜甫詩中的忠義之氣，而不太欣賞充斥「婦人酒」的李白詩，所以只著意於回應歐陽修第二句「吏部文章」的時代命題，而對於首句的「翰林風月」則置之不答。論文不論詩，避免在初相識的場合中引發爭拗。此外，我也想順帶說明對頷聯的一些看法。按照傳統的解釋，且配合曾鞏「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一語，則王安石詩中的孟子、韓公本來並不費解。依照字面的解釋，「我以孟子、韓愈為學習的榜樣，希望將來或許能趕上他們的成就，但恐怕終身只是妄想」。「可見在他們的心目中，『道統』與『文統』是二而一的東西。歷來註家都忽略了這一點，便把兩句割裂開來解釋，自然便難以自圓其說。又：這裏亦有以孟軻、韓愈推許歐陽修之意，是回答贈詩前四句的」。³² 大抵是王安石謙稱學力尚淺未足以言道義文章，不敢與孟子、韓愈相比，乃用了互文見義的修辭手法，而將歐陽修的道德文章比喻為孟子、

²⁸ 《歐陽修全集》，冊三，卷五十七，頁813。

²⁹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云：「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歐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卷三十，頁209) 此說沒有多少說服力，無法顯示歐陽修廣納賢才、推動古文運動的決心。

³⁰ 宋曾鞏：《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第十六，頁255。

³¹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頁264。首聯校云：「『猶在』，一作『雖壯』；『強學』，一作『學作』。」

³² 參周錫韜(1940-)《選注》：《王安石詩選》(香港：三聯書店，1983年)，頁49，50。注文原作「終生」，誤，今據王安石原作訂正為「終身」。

韓公，自成一說。可是如果順著這兩句的語序來說，則是止於窺孟子而不敢望韓公，似乎孟子的層次尚較韓愈為低，甚至不敢與韓公相提並論了，揆諸事義，於理不合。這裏如果配合唱和詩的體例，「韓公」或喻歐陽修，則「孟子」可能是指孟郊，而有自喻的成分了。韓愈〈孟生詩〉云：「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³³韓孟即喻師門交誼。當時歐陽修任翰林學士，王安石任群牧判官，歐陽修在政壇和文壇上的地位都遠比王安石為高，王安石以「諸生」自比，蓋亦以得入歐門為榮也。惟此說與傳統的解釋距離太遠，可能失之偏頗，不敢自以為是，謹供讀者參考。案蔡上翔云：

歐陽公詩好李白，文宗韓昌黎。故云「老去自憐心尚在」，三句作一氣讀，蓋公所以自道也。「後來誰與子爭先」，則始及介甫矣。唐鄭谷〈讀太白集詩〉曰：「高吟大醉三千首。」此首句所由來也。唐以文取士，二百年間獨高韓吏部，一見於孫樵集。若如歐公〈記舊本韓文〉云：「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又寄蘇子美詩：「韓孟於文辭，兩雄力相當。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則皆可為次句確證。³⁴

歐陽修詩中的「韓孟」當指韓愈與孟郊的古文，比喻師友交誼，相互砥礪，兩雄才力相當，同是沈埋二百年之久。王安石如果也用韓、孟來比喻歐陽修和自己的關係，看來也添些旁證了。宋代詩壇一般重視文藝的社會功能，推崇忠義和氣節，故尊杜是必然的選擇。至於抑李與否，則端看個人的取態了。王安石固然不能欣賞李白詩，即如蘇轍(1039-1112)雖然宗仰歐陽修的人格器度，但論詩崇杜抑李，亦與歐陽修異趣。〈詩病五事〉第一則即嚴厲指出李白詩的缺失所在。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³⁵

³³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12。

³⁴ 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新一版)，頁84。

³⁵ 蘇轍〈詩病五事〉分別討論李白、白居易、韓愈、孟郊、王安石五家的詩病所在。參《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三冊，頁1228。

大抵蘇轍著眼於個人的道德操守多於才情詩藝，評論的標準是「杜甫有好義之心」，而李白「不知義理之所在」，失之拘謹，自然也無法欣賞詩人特有的浪漫氣質了。可見性向所限，不可強求。在宋人眼中，李白的優點和缺點都是相當清楚的，讀書人自有主意，不會盲目崇拜。由此也可以看出歐門有容人之量，人才輩出。

這裏擬附帶一談曾鞏，他是歐門最早的核心成員，甚至促成了歐陽修與王安石相識，引為知己，切磋砥礪，大家合力推動古文運動的大業。曾鞏以文章傳世，詩不如文，但對李白卻深感興趣，他讀到了宋敏求所編的《李白詩集》二十卷，先後寫下了〈李白詩集後序〉、〈代人祭李白文〉二文。其〈謁李白墓〉詩云：「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³⁶此詩首聯全仿歐陽修的音調句法，惟詩質稀薄，力有不逮，可能性分不同，才具各異，曾鞏詩自然不能與歐、王二公的文采風流相提並論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裏也可以看出北宋文壇擅於博覽眾長、採納英華的文藝氣象了。據說曾鞏亦嘗編《太白集》，蘇軾〈書諸集偽謬〉云：「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³⁷可是不辨真偽，未能捕捉詩歌特有的品味和感覺，曾鞏之於李白詩，終隔一層。

蘇軾捕捉三百年獨有之樂

歐陽修帶領宋詩由唐詩璀璨的光環中走出來，寫出新意，沒有淪為唐詩的附庸，已足以說是「超越李白」了。至於蘇軾，早年欣賞杜甫的忠義之氣，挺身許國，有用世之志；其後疊遭打擊，多難畏禍，也就逐步融入陶淵明平淡閒遠的風格去了。其實蘇軾「行雲流水，初無定質」³⁸的精神氣象，更與李白貼近。蘇軾仰慕李白，以步趨李白為樂，捕捉一種「三百餘年」的獨有之樂，以至一種特殊的生活品味。〈百步洪〉二首序云：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為陳跡，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³⁹

³⁶ 《曾鞏集》，卷第六，頁89。又〈李白詩集後序〉、〈代人祭李白文〉，頁193，533。

³⁷ 《蘇軾文集》，冊五，頁2098。文中所評另一人為「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

³⁸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載《蘇軾文集》，冊四，頁1418。

³⁹ 《蘇軾詩集》，冊三，卷十七，頁891。

此事復見於蘇軾〈王定國詩集敘〉，津津樂道，神氣自若：「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⁴⁰

蘇軾困於公事，未能與王鞏同游。但夜著羽衣，心靈超飛求索於上下古今之間，一方面追縱友人的行止，心領神會；一方面逆探李白的詩心，無中生有。蘇軾雄姿英發，圓融自足，往往帶出了生命的熱鬧豐盛，不啻李白復生。蘇軾並沒有著眼於字斟句酌的神似而已，而是超脫時空的拘束，神魂合一，直探詩心。遊戲仙凡之間，自然又高於歐陽修「超越李白」相互對立的境界了。

蘇軾〈寒食雨〉⁴¹ 二首膾炙人口，《三希堂法帖》載有墨跡刻石，書法尤為橫放傑出，令人神往。黃庭堅〈跋東坡書寒食詩〉云：「蘇軾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⁴²

黃庭堅沒有明確指出李白「未到處」何在，我想指的可能是一種生命境界。蘇軾二詩充滿寫實意味，其一「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寫出光陰飛逝，不由人意安排；其二「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寫出了窮途絕路，仍然心繫家國。蘇軾忘懷個人得失，安之若命，表現內斂和節制，收放自如。這大概就是李白的「未到處」了。至於書法方面，蘇軾參透了顏真卿(708-784)、楊凝式(873-954)、李建中(945-1013)諸家的筆意，寫出瀟灑的尚意書風，體現自我的精神生命，深具大家風度。他日事過境遷，都成陳跡，自然更無法重寫一次了。此外，黃庭堅更多次將蘇軾詩的成就比擬為李白，〈跋東坡書〉云：「東坡書如華嶽三峰，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跋東坡鐵柱杖詩〉：「〈鐵柱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柱杖均為瑰瑋驚人也。」可見黃庭堅對於蘇軾與李白兩人風流倜儻的精神氣象是能夠確切地感受到、把握到的，否則不會一再的以此喻彼，而這種識見更是無法純用文字表達出來的。這是一種眼光，也是高水平的精神交感，可意會而不能言傳，求之後世，亦不多見。只有才學兼賅，始得看透。當時宋仁宗也有這種眼光，認為蘇軾是能超

⁴⁰ 《蘇軾文集》，冊一，頁318。

⁴¹ 《蘇軾詩集》，冊四，卷二十一，頁1112。

⁴² 原稿墨蹟載《中國著名碑帖選集·宋蘇軾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冊22，頁9-11。案通行本首句作「東坡此書似李太白」，誤「詩」為「書」。參黃庭堅(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頁229；又《黃庭堅全集》，冊三，頁1608；均誤。



越李白的。陳巖肖云：「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⁴³

可見宋仁宗對蘇軾還是相當理解的，甚至能指出李白的缺失所在，一語中的，極有知人之明。其實宋代印刷術的發達帶動了知識的飛躍，城市興旺；而科舉的機會也突破了門第的局限，廣納人才。宋代社會尊重知識，整體文化是比唐代進步了，而士子的精神氣象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程傑云：「初、盛唐文人漫遊任俠、求仙成風，科舉又待『行卷』，尋遇知己，遍謁諸侯，功夫多在詩外，提倡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過的不是書齋文士生活。這一情況到中唐時期有所改變，越來越多的下層庶族子弟投身場屋，謀求起身之機，他們望小資淺，惟有場屋可恃。高門、白屋互相競長，士風學風為之一變。」⁴⁴ 這種風氣到了宋代當然更是變本加厲了，宋仁宗的觀點其實也是體現了時代的共識，才學相兼，擲地有聲。真正的藝術是不可能複製的，詩人不但要超越李白，甚至還要超越自我，健行不息，始臻高境。歐、蘇洋溢著樂觀自信的情緒，指示發展的方向，並由此而創新一代文風，足與李、杜後先輝映了。

其實蘇軾對於李白也表現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杜甫說：「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⁴⁵ 固是知己之言。而蘇軾隔代相知，通於身世之感，自然更感共鳴了。蘇軾〈李太白碑陰記〉專辯李白從永王璘事：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今宏大。陵轡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跼躅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⁴⁶

⁴³ 《黃庭堅全集》，第二冊，頁774；第三冊，頁1612；陳巖肖（約1151前後）：《庚溪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冊三，頁2794。

⁴⁴ 《北宋詩文革新研究》，頁239。

⁴⁵ 杜甫：〈不見〉，載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一版），卷八，頁373。

⁴⁶ 《蘇軾文集》，冊二，頁348。

在宋人一片崇尚氣節、義正詞嚴的討李聲中，蘇軾卻刻意為李白辯解。他欣賞李白「士以氣為主」，氣壯則理直，必具識見。最後蘇軾以「迫脅」為辭，雖有強辭奪理之嫌，但對於李白內心的悲哀卻還是深有同感的，所以持論與世相違，不隨流俗。此外，蘇軾在題跋中有時還提及李白詩的優劣高下，情理具在，自然更具知人之明了。〈書李白集〉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李太白作。蓋唐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縣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縣，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耶？」〈書學太白詩〉云：「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準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為一笑。」⁴⁷大抵李白詩的優點是「豪俊」、「飄逸絕塵」，才情豔發，古今難及；缺點則是「臨時率然之句」、「而傷於易」，詩以表現情意為主，不屑於字斟句酌。後人不解，只能「醉中聊為一笑」而已。杜甫以外，蘇軾對李白可以說是充分了解的，甚至深入李白的內心世界，不徒是執著外表的字句和行徑。其實，在眾多的後代詩人中，蘇軾才學相兼，最能揣摩李白的聲情氣象，飛揚而不跋扈，反而多了一些深刻和節制，而這自然是蘇軾學習李白而又超越李白的地方了。崇寧元年(1102)蘇軾逝世之後，黃庭堅在荊南作〈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云：「不見兩謫仙，長懷倚脩竹。行遶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砥柱閱頽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醅熟。」⁴⁸蘇李並稱，皆為「謫仙」，明珠光燦，氣象相侔；他們遭遇亦復相似，由絢爛而復歸寂寞，「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更顯出一種孤懷獨往的悲情，益顯當政之無知。黃庭堅的才氣不逮蘇軾，卻由學養補足，所以他最能體會蘇軾的內心世界，即如杜甫是李白的知音一樣，歷史上人才相遇，何其巧合！

結 論

文學的發展固然與客觀的世界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主體的心靈建設。客觀的世界不斷改進，主體的心靈建設自然也得不斷的超越和提高了。魏晉文學相對於秦漢來說已顯出進步飛躍。唐代詩文更是光輝璀璨，高潮疊起。宋人要在前代和當代眾星拱照、名家輩出的文壇中決圍而出，制敵爭勝，自然更需一番勇毅和努力了。但文

⁴⁷ 同上注，冊五，頁2096、2098。

⁴⁸ 《黃庭堅全集》，第一冊，頁62。

學發展也得由人才帶動，宋代尊重士人，士人回饋時代，教育的意義在於培育道德氣節和社會責任，因此人才輩出，議論鋒起，提高了士人超越爭勝的心靈素質，影響及於整體社會，而文學的發展自然也沾溉於教育的功效而得以展翅騰飛了。張毅云：

最能體現宋代文學思想發展的自立創新意識的，還是宋代作家自我樹立時的內在超越精神。所謂內在超越是對主體內在才性和品格的要求，集中反映在作家主體人格建構過程中對生命存在意義的體認和自我心性的反省。這使作家的創作視野由外部客觀世界的自然和社會轉向主體內心的精神世界。對生命本體和存在價值的探索，對複雜人性和深邃心靈的體驗感悟，構成了宋代作家以寫心表意為主而追求人格樹立和自我超越的藝術創造方式。代表作家的創作個性和主體人格成為推動文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它能影響其他作家而使一種創作傾向成為思潮，形成文學流派。⁴⁹

因此，我們可以說，北宋詩壇洋溢著一種「內在超越精神」，也就是一種競勝之心。作家講求人格樹立，重視藝術創意，甚至形成共識，表現出一代獨有的文藝氣象，文藝朝著普及化和深化兩個方向同步發展。萬馬奔騰，捷足先登，人才是掩埋不了的，而歷史更是最公正的裁判。

上文主要以歐、蘇為例，說明「超越李白」的象徵意義。歐、蘇才學相埒，足以相互欣賞，出入百代。大抵歐陽修所得者為氣格，形象新穎；蘇軾所得者為意趣，文采風流。其他王安石、蘇轍雖然指出李白的詩病所在，只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李白的作品，但都沒有否定李白之意。曾鞏詩才平庸，卻對李白表現出景仰之情，不勉力求成，更是一種正確的學習態度。黃庭堅好將蘇軾與李白並論，獨探詩心，別具慧眼，在宋詩中成就特大。宋人徜徉於詩詞書畫的繁花藝苑之中，學殖深厚，用力日久，亦足以抗衡李白的才情。王安石、黃庭堅尊崇詩聖杜甫，知己知彼，取長補短，開拓局面，自然更超越一般模仿的意義了。

現在我們已經步入第二個千禧年的時代，有必要重塑新世紀的文藝精神，摒棄模擬，重拾自信。後現代的詩學觀念再沒有大一統的中心，中心植根於自我之中，由內而外，表現一種多元對話的格局，相互激蕩。其實名家並沒有甚麼秘密可言，它只是盡量發揮個人的創意和長處，在最不為人所注意的地方、或者最不經意的時候冒出來，讓大家耳目一新。如果大家都一窩蜂的模仿步趨、趨之若鶩的時候，也就沒有甚麼值得驚豔了。所以「超越李白」的途徑很多，有時會是字句的高下優劣，有時會是題材的開拓，有時會是內在的精神境界，有時則是生活品味，形形色色，生

⁴⁹ 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4。

生不絕。寫作的形式變化百出，寫之不盡，任何名家只要能在小範圍內努力開拓就很夠了，表現時代社會的神明變化，我們儘有發揮的空間，不必過慮。⁵⁰

景仰的對象就是我們所欲學習的對象，學習的對象就是我們所欲超越的對象。因此，「超越李白」並不是叫我們複製李白，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同時這也太沒有志氣了。在古人的唾餘中討生活，卑躬屈膝，這又何苦呢？最理想的是知己知彼，突圍而出。時代不同，環境各異，無論思維意識、語言文體、審美趣味、表現方式都有所不同。怎樣鍛煉眼光，創新意念，取長補短，生生不息，發掘前人所沒有的品種，從學習到超越，永無止境。即使最後的對手只剩下了自我，天地蒼茫，也要超之越之，才可以從有限中追求無限，這是藝術最高最渾成的境界，也是詩人最大的發現和滿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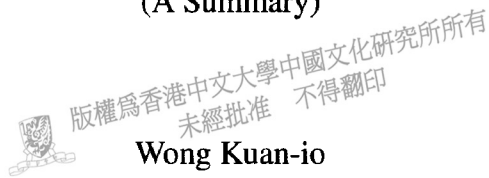
50

錢鍾書 (1908–1998) 《宋詩選注·序》云：「據說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候，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一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13）



Transcending Li Bo: On the Literary Atmosphere of the Poetic Arena in Northern Song Times

(A Summary)



Wong Kuan-io

This paper is mainly focused on how the famous Northern Song writers attempted to learn from the Tang poet Li Bo. Ouyang Xiu claimed that he aspired to transcend Li Bo, while Su Shi opined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Li Bo the kind of poetic music as exemplified by the Tang master poet had ceased to exist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Both Ouyang and Su are poets of great talents and here we detect a literary atmosphere permeated with vigor and self-confidence. They tried to create their own styles, not just imitating the master. Moreover, Wang Anshi pointed out the weaknesses of Li Bo's characters and proposed rectifying the then poetic fashion by paying homage to the poetry of Du Fu. This is also a proper attitude of learning, again signify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Li Bo. Huang Tingjian had high regard for Du Fu, and, at the same time, admired Li Bo and Su Shi. Huang had benefitted himself from both poets and others, shaking off the vulgar influence, and established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le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se poet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exactly a millennium away from 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we, while speaking of promoting and rejuvenating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se poets and the ways they transcended the masters.

